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效率、公平与产权

〔英〕詹姆斯·E·米德 著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中国农村改革与农村发展研究

效率、公平与产权

（美）詹姆斯·C·斯科特 著

中国农村改革与农村发展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效率、公平与产权

〔英〕詹姆斯·E·米德 著
施 仁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北京

效率、公平与产权

Xiao lu, Gongbing Yu chanquan

〔英〕詹姆斯·E·米德著

施 仁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625印张 328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6000

ISBN7-5638-0332-7/F·196

定价: 6.9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厉以宁	宋承先	张培刚	胡代光
	钱荣堃	高鸿业	黄范章	谭崇台
主编	贾湛	梁小民		
编委	于同申	厉以平	何宝玉	李玉臣
	吴珠华	吴衡康	杨仲伟	杨德明
	宋慧毅	邹蓝	范恒山	冼国明
	俞品根	施炜	顾昕	舒元
	薛进军	薛捷		

编者献词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介绍了不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使这种介绍更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我们决定系统地翻译出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的主要著作,作为翻译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本丛书从1988年开始陆续出版。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奖。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建立300周年时为纪念诺贝尔奖金提供者而设立的基金,全称是“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组成的“经济科学委员会”评定。从1969年起在每年的10月中旬与其他各项诺贝尔奖同时公布,到1987年为止已颁发19届,共有欧美的25位经济学家获奖。获奖的经济学家们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读者通过这些著作能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从中吸取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发展有价值的东西。

当代西方经济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数学方法的应用。经济学要反映经济中的数量关系,因此,经济学与数学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7世纪起经济学家就用数学公式来表述经济理论。本世纪以后经济学家又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了经济计量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经济学精密化、实用化的标志。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挪威经济学家R·费瑞希和荷兰经

济学家J·丁伯根是经济计量学的创立者。以后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逊、K·阿罗、W·里昂惕夫、P·库普曼、L·克莱因、G·德布鲁、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苏联经济学家L·康托洛维奇都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流派林立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综合派是公认的“主流派”。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对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属于这一派的有相当比例，如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逊、L·克莱因、J·托宾、F·莫迪利亚尼、R·索洛，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70年代后西方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的显著变化是自由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强。代表自由主义的奥地利经济学家F·哈耶克、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G·斯蒂格勒、J·布坎南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便反映了这种趋势。

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因此，获奖者中还有一批对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和英国经济学家R·斯通对国民收入统计作出开创性贡献；美国经济学家A·刘易斯和T·舒尔茨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有独特贡献；瑞典经济学家B·奥林和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H·西蒙对管理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本丛书的选编以获奖者的代表作，特别是在西方经济中影响重大的名著以及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启发和借鉴的著作为主，每位获奖者的著作至少选一本，以保持其系统性与代表性。

还应该说明的是，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获奖的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学者，因而在这些著作中必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阅读时我们应注意这一点。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有其不可忽视的精华，资产阶级学者对经

济问题的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以分析的态度认真阅读这些著作，必将得到许多有益的收获。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老一代学者与中青年学者的关心与帮助，谨向关心与帮助这套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所有朋友表示感谢。

编委会

1988年4月

译者的话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是世界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1907年生于英国，1925年和1928年分别就读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并分别获得了硕士学位。1930年毕业后在牛津的赫特福德学院任教，1938年到日内瓦国际联盟经济部工作，1940年重返英国，后曾任英国政府办公厅经济部主任；1947年到伦敦经济学院任贸易学教授，1957年成为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和政治经济学教授；1969年到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直到1974年退休。米德曾经获得了许多荣誉和职位：1964—1966年米德教授是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75—1977年曾任英国财政科学研究所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享有许多荣誉职位。1977年他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伯蒂尔·俄林教授分享)。

到目前为止，米德教授已经出版了近40部重要著作以及60多篇论文，在西方经济学界、尤其在英国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1936年)；《国民收入与支出》(与理查德·斯通教授合著，1944年)；《计划与价格机制》(1948年)；两卷本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1951年，第二卷《贸易与福利》，1955年)；《关税联盟理论》(1955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1961年)；《效率、公平与产权》(1964年)；四卷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卷《静止经济》，1965年，第二卷《增长经济》，1968年，第三卷《管制经济》，1972年，第四卷《公正经济》，1976年)；《指导性计划理论》(1970年)；《外部经济效应理论》(1972年)；《明智的激进派的政策指南》(1975年)；《直接税的结构与改革》(1978年)；两卷本的《停滞膨胀》(与他人合著，第一卷《工资决定》，1981年，

第二卷《需求管理》，1983年)等。

米德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概括地讲，就是如何运用经济理论制定经济政策。本书选辑了米德教授从不同方面论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的三本短小精辟的论著和三篇论文，汇编成册，并以其中的《效率、公平与产权》为书名。这些论著在西方都是非常著名的，虽然从题目上看这些论著似乎联系不大，但实质上，它们都是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即如何设计、制定并运用一些适宜的经济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达到社会期望的各种目标。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难免有一些不妥甚或错误之处，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1992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一、效率、公平与产权	(1)
前言	(1)
I. 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	(2)
II. 发达国家的现状	(17)
III. 工会国家	(24)
IV. 福利国家	(27)
V. 财产占有的民主国家	(29)
VI. 社会主义国家	(54)
VII. 结论	(62)
二、不公平的遗传	(77)
三、计划与价格机制	(107)
前言	(107)
I. 问题的表述	(113)
II.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控制	(124)
III. 收入和财产的分配	(146)
IV. 垄断问题	(166)
V. 财政政策与收支平衡	(185)
四、指导性计划理论	(233)
I. “市场”与“环境”的不确定性	(234)
II. 在没有环境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的 期货市场、指定性计划和计量经济预测	(238)
III. 环境的不确定性与期货市场	(247)
IV. 环境的不确定性与指导性计划	(258)
V. 人口统计上的转变	(262)

VI. 环境—时间路径的多重性·····	(265)
VII. 划划网络·····	(274)
VIII. 垄断条件下的指导计划·····	(278)
IX. 缺乏保险市场·····	(283)
X. 政府的控制计划·····	(290)
五、外部经济效应理论·····	(302)
I. 外在性的定义·····	(302)
II. 导致实际收入外在性的条件·····	(313)
III. 实际收入外在性的内在化·····	(333)
IV. 外在性的政府管制·····	(343)
六、竞争条件下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	(377)

效率、公平与产权

前 言

这本小册子的基本材料，是我1964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给大学和商学院的学生们所作的几次演讲。我首先要感谢邀请我去发表演讲的两所大学，以及英国议会和欧洲议会，它们使我的访问得以成行。除此以外，我还要感谢《经济学杂志》编辑部，允许我从自己1961年9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文章：“毛里求斯：马尔萨斯经济学的一个案例研究”中摘用某些材料。

这些演讲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伴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它的重要性还在日益增加。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它却一直被人们忽视了，特别是在英国。瑞典有好几种财产税，其中包括：（1）对资本收益计征的一种累进税；（2）对每个人拥有的财产总量计征的一种累进税；（3）对活着的人们之间的馈赠计征的一种累进税；以及（4）对个人的遗产计征的一种累进税。因此，我恳求阅读这本小册子的每一位英国同胞，千万不要抗议：“不能那样做！”。

詹姆斯·E·米德
剑桥，基督学院
1964年5月

I . 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

下面的论述，主要是分析价格机制的双重功能。一种商品或者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既决定着这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使用状况，也决定着这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出售该商品或生产要素能够得到多少实际收入。我们分别把上述两种情况，称为价格的“效率”方面和“分配”方面。所有的职业经济学家都清楚地知道，不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还是在其它市场上，计划当局恰当地运用相对价格，都会有助于指导经济系统“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所谓有效，也就是说，让资源的使用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一个人要想使自己处境更佳，必须以使其它人处境更差为前提。这是因为，只要稀缺资源的价格较高，而供给丰富的资源价格较低，资源的使用者总是会努力按照“有效”的方式，即使用较少的稀缺资源、较多的丰富资源，来满足自己对资源的需求；这里的使用者，不管是购买原材料和其它生产要素投入某些生产过程的企业主，还是直接购买消费品和服务的家庭主妇，都将这样做。但是，这样一种有效的体制必然会导致实际财富的分配非常令人失望。举例来说，A公民只拥有某种生产要素（比如说他自己的不熟练劳动），除此而外，一无所有，他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很低，而他的家庭必需的生活用品的价格却很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B公民正好拥有一种价格极高的生产要素（比如一种稀缺的自然资源），而他的家庭迫切需要的又恰好是十分廉价的娱乐用品。两相比较而言，A公民无疑贫穷之极。

当然，我并不认为，采取一种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让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来决定一切，就会导致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职业经济学家们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办法遇到的障碍。只有

采取其它不同的政策措施，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1) 必须采取必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控制对商品和劳务的有效需求总量，以维持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环境。

(2) 有必要采用法国式的预测和计划方法、或者英国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方法，以便使许多独立的决策单位，对于未来条件的变化趋势，有一个更准确、更一致的看法。

(3) 垄断力量和市场的不完全会引起价格和成本之间出现过分的差异。要解决这类问题，也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如价格管制、立法禁止限制性行为、给竞争性产品的进口赋予更大的自由等。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实行社会化以及集中的公共管理，可能是更好的办法。

(4)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难以计数的外部经济和不经济的例子（诸如城市中机动车运输造成的拥挤、噪音和恶臭等），政府必须运用征税、补贴、管制等手段，使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趋向一致。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比如警察、国防、法庭等，其社会利益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个人利益，因而，这些活动最好是由公共机构直接管理。

(5) 消费者是无知的、轻信的。政府显然需要抑制私人的商业广告，鼓励人们进行公正的无偏见的消费研究和信息服务工作。

诸如此类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继续列举。不过，这些问题与我们目前所要研究的课题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的论点只是说，即使政府已经做了维持这种体制有效运行所应该做的所有工作，也仍然有必要运用价格机制作为效率的一个指南。在一个现代的复杂经济中，政府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以确保经济体制使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起来；即使如此，为了指导日常生活中的决策者们（不管他们是私人企业主、公共机构的公务员，还是家庭主妇），确定哪种东西是稀缺的，哪些是丰富的，还必须给不同的生产要素以及不同的最终产品和服务贴上一个价格

标签。但是，用于达到这种效率的价格，将会导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很不公平。

这种两难困境的例子不胜枚举。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从世界的效率观点来看，要最充分地使用这些丰富的资源，常常要求丰富的初级产品保持较低的价格水平；可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者可能正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在一篇题目为《国际商品政策》的文章里，^①我曾经试图设计出一项政策，把初级产品价格的“效率”效应和“分配”效应区别开来。

下面，我将以更细致的方式，对另一种或许更基本的价格，设计一项相应的政策。我要研究的这种特殊价格，是劳动力的工资率，它达到什么水平才能产生最重要的“效率”效应和“分配”效应。我将要提出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基本上都是影响财产所有权的。最近以来，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大大地忽视了这种改革。但是，我们的目的正是要指出，在长期，必须把进行这种改革作为首要的措施，使实际工资水平预期的“效率”方面与“分配”方面一致起来。

在世界上的一些人口严重过剩的不发达国家里，实际工资率水平产生的两难困境，目前正以它的最完整形式体现出来。我在1961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里，^②已经概括指出了，在诸如毛里求斯那样的经济中，价格的这个两难困境究竟是什么性质。毛里求斯只是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类国家里几乎都出现了人口爆炸。

毛里求斯是一个位于印度洋边的小国家，它的人口很多，而且增长得非常迅速。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以生产糖为主。它是单一作物经济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毛里求斯的全部出口产品量

①这篇论文是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而写的，后来又发表于《劳埃德银行评论》，1964年6月。

②请看《毛里求斯：马尔萨斯经济学的一个案例研究》，载于《经济学杂志》，1961年9月。下文的分析就是以该文为基础的。

中，糖占有99%，而且糖业生产占其全国总产出量的40%到50%。大的糖厂和大部分优质土地，均归富有的种植园主所拥有，其中多数种植园主是法裔毛里求斯人；而糖业生产则由比较贫穷的工人进行，其中的多数工人都是印度血统的毛里求斯人。1946—1947年期间，毛里求斯彻底废除了疟疾，人口死亡率从44%左右下降到14%，但人口的出生率却没有相应地降低。于是，人口便开始按照每年3%的速度不断递增。既然15年以后将要走上工作岗位的人现在都已经出生了，人们现在就可以计算出，不管此后的人口出生率发生什么变化，15年以内全国的劳动力将比现在增加一半。因此，虽然目前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但在未来，毛里求斯的人口压力会变得更强大得多。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古典经济理论是怎样分析这个问题的。在毛里求斯的经济中，不熟练劳动力特别丰富，土地和资本设备十分稀缺。按照古典的竞争经济理论，在这种状况下，土地的租金、利润率、利息率都将会提高，实际工资率则应该下降。这将刺激每个私人生产者以及公共机构的生产者，主要生产那些需要很多劳动力、较少土地和资本的产品，或者提供此类服务，并且选择那些运用较多劳动力、较少土地和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技术。

最终的目的，自然不是提供就业，而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的稀缺资源（土地和资本）以及丰富资源（劳动力），获得可能的最大产出量。这正是古典价格机制预期会发生的事情。租金和利息率的上升以及工资率的下降，将会诱使生产者在一定量的土地和资本上雇用更多的劳动力，但它有一个前提，即这样做能够获得更大的产出量。没有任何一位企业主，为了生产出一个数量更小或价值量更小的产出量，要在给定数量的土地和资本上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其实，为了使工作真正有效，生产者不会选择无效率的技术，这正是如此运用价格机制的主要优点之一。

在像毛里求斯那样的经济里，这个原则是很适用的——对此，几乎没有什么疑问。我们只要略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了。